

■遲子建認為香港並非文化沙漠。



「媛創文藝」 盡顯服飾中國風

在香港，旗袍等傳統服飾，成為了在極為正式和莊重的社交場合中，名流着裝的一個選項。因為此一服飾背後所蘊含的傳統儀態之美與經典傳承，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內涵。而如今，對着裝的考究，在一河之隔的深圳也逐漸風行，成為了追古時尚風的一項時代印跡。

日前，在深圳福田區星河中心錦雲唐舉行了一場以「更衣記」為主題的文藝沙龍活動。「更衣記」乃是出自張愛玲所寫的《更衣記》。這是張愛玲22歲時所寫的文章，對衣着的體驗與敘述極為詳盡與深刻。衣着，不僅是遮蔽軀體的禦寒之縷，也是一種承載着道德與倫理的文化符號，亦是女性追求唯美的一種實踐，更是男性展現自我風範和涵養的外在表現。是次文藝沙龍，在傳承了百年服飾文化的錦雲唐的倡導下，融匯了「媛創文藝」的時代化城市雅緻藝術風範。此藝術風，是一種圍繞着女性文學、詩歌、繪畫等形式而構成的現代城市女性內外兼修的高雅生活方式，性別之美被進一步突出。

今次沙龍活動中，女主持人及在場女士身着旗袍，而男嘉賓則全部身着長衫，形成一道非常特別而亮麗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生活風貌。在沙龍論壇互動中，有嘉賓表示，服飾乃中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衣冠服飾在古代中國不僅僅是身份、地位的體現，同時也是一個人道德與文化修養的象徵。例如，在漢語的成語中，有「衣冠禽獸」、「衣冠楚楚」這樣的詞彙，即表示，一個人的內在與其外在有着息息相關的密切聯繫。而在民國時期，身着長衫的人，被視為是有文化和學養的知識分子，因此長衫也在那個年代被稱之為「文明衫」。因此，一些參與論壇的嘉賓表示，服飾所承載的大眾期待和文化符號意義，是不能夠忽視的，服飾也是中國人找尋文化之根的一個途徑。

今次文化沙龍活動乃是「深圳全民寫作計劃」為推行品牌故事、攜手錦雲唐舉辦的第二場活動，也是「媛創文藝」首次正式亮相。據悉，今後還會成立「媛創文藝社」，作為女性文藝咖的活動大本營，這些都將成為深圳都市文化的城市名片。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嘉賓們身着長衫成為展覽的一個亮點。

遲子建 河流乃文學的血脈

遲子建說，一九九六年當獲知自己的短篇小說《霧月牛欄》得到首屆魯迅文學獎時，乃處於一種「無知無覺」的狀態，去北京領了一次獎而已。那時的獎金也很少，兩千塊，黑龍江作協也沒有因此獎而獎勵她，那時大家都抱着平常心看待文學獎項。

她說，來到香港，看到規模宏大的書展，足以證明香港不是一個文化沙漠，但熱鬧過後，那些被讀者買走的書，是否有被捧讀的可能，又有多少無價值的書被扔掉，這是她所關心的。談到自己的文學創作，則要從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那條清澈河流說起。

遲子建認為，河流，乃一個民族文學的血脈。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文學作品中的河流，猶如「靜靜的頓河」，孕育出哥薩克在急劇變革時代中的驍勇和彷徨。這種複雜的人性與歷史的深度，深深感染着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部落的樂天、幸福的生活方式，在遲子建的筆下顯得彌足珍貴。擴展到整個黑土地的滄桑歷史，她心中所屬意的人性，在歷史的旋流中深邃而複雜，這便是她對寫作的理解。

俄蘇文學影響甚巨

遲子建直言，曾經生活在中俄邊境的歲月，讓她對對岸那片土地懷抱着執著般的好奇。「一江之隔，但膚色、語言則完全不同，而恰恰是文學讓大家知道了那片土地上的人和故事。」她這樣形容文學在領略俄蘇歷史文化中的意義和作用。

「俄蘇文學作品對我這個年齡層的人影響巨大，因為中國與前蘇聯的特殊關係，中國譯介俄羅斯文學作品在國外文學中的比例和數量，都是非常之多的。」遲子建以一種縱向歷史的深度回溯這個世界上領土最為廣袤的國度的文學與中國人之間的情愫。「俄羅斯文學具有的氣質，與它遼闊的土地有很大的關係，在這片土地上，博大幽深的河谷所孕育和象徵的那種帶有深沉、寧靜質的俄羅斯文化以及整個俄羅斯民族苦難史中的人性，具有一種別樣的深度。」她對俄羅斯文化與文學的這一評價，其實也是對自己的創作與俄羅斯文學之間的一次總結。

遲子建認為，俄羅斯文學多書寫複雜的人性：「一片凍土之上，陽光照落，這種泥濘中的爛漫春光，便是俄羅斯文學中的『優美』之感，因此俄羅斯文學永遠也不會過時。」據此，即便是在在深

刻影響和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蘇聯時代，無論是《日瓦戈醫生》抑或《靜靜的頓河》，在遲子建看來，都有着無比深厚的精神深度。

在寫作中尋找自信

俄蘇文學對遲子建的創作產生了影響。從《靜靜的頓河》到《額爾古納河右岸》，這條文學之路，也是遲子建在寫作中不斷思索的。《靜靜的頓河》中，在紅色大革命的時代，哥薩克群體要在急速變化的時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那些淳樸的部落也要在大變革中審視自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們的文學場域不同，但相同的卻是——背後都有一條清澈而具有詩意的河流。

河流在文學意象中是什麼？遲子建比喻道：「就我自己的理解而言，河流乃是一個民族與其文學的血脈所在，是否有病灶，是否阻塞，影響着一個民族的文化；而在我的感受中，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文學界，不少作家們生存出現了困難，文學成為了『迷航中的燈塔』，因此如何撥開這些迷霧，考驗着這些寫作者。」

在遲子建的作品中，河流是不可缺少的——「在我看來，額爾古納河，是中國最為清澈的河流。」也是遲子建在寫作中找尋到的自信。遲子建對記者表示，《額爾古納河右岸》中，她筆下的那個部落，其生活方式、信仰，與現代生活產生碰撞，但她自己認為，這種生



■遲子建向香港讀者講述自己的文學觀。



■歷時兩年寫成的《群山之巔》，以中國北方一個名為龍蓋的小鎮作背景，寫滾滾紅塵的愛恨情仇。

■《偽滿洲國》分上下兩本，寫盡這個時代的小人物生活。



活方式，乃是不應該忘記的記憶。

「其實，這些部落一直都覺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很富有，他們曾經用打獵獲得的獸皮下山換取肥皂等生活日用品。他們生活方式的改變，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步驟，畢竟，房屋有自來水、出門有醫院，被視為是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無可厚非。但生活方式的改變，亦會帶來心靈的改變，因此，在我看來，這個部落的生活方式，可以被看作是發展中的文明活化石。」遲子建的這一番話，是文明演進的刻畫，也是書寫河流與心靈結的白描，坦率而豐富。

歷史書寫複雜人性

遲子建成長的黑龍江，曾經歷過十四年淪陷歲月。自1931年至1945年，當時的日本關東軍佔據了中國東北，並扶持溥儀帝溥儀成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偽滿時期，在遲子建看來，是一段不能抹去的記憶，在個人情感中如此，在文學的寫作中同樣也如此。

「曾經在一次訪問日本的活動中，一個日本人以『滿洲國』稱呼現在的東北地區，引起了我的不平，後來我對自己的

這一情感反應進行了自我審視，思索為何這一詞彙中國人特別是東北地區的中國人而言，會產生情感的震盪。」遲子建向記者講述了自己這一段往事。她提及，偽滿作為一個傀儡政權，需要以文學的表達去表現那一段歷史，而描繪那一段歷史，首先是要尊重歷史。遲子建認為，歷史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場域，既有兇惡的敵人，但在日本軍隊中，某些具有反戰情緒的士兵，也有其人性的一面，因為這些具有反戰心態的士兵，某種意義上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所以她將這部長篇小說的篇名，定名為《偽滿洲國》。

「在《群山之巔》中，寫到了日本的開拓團，他們這一群體中，我寫了一個種植水稻的日本女子；日本軍部訓練開拓團乃是希望其成為軍人影子，但在某個層面上，開拓團是一個悲劇。這就是歷史中的複雜人性。」遲子建如是說。近年來，關於香港是否「文化沙漠」的爭論愈演愈烈。遲子建作為一名對香港有着深厚情感的內地作家如何看待這一問題，也引起記者的興趣。「如果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那麼還會有這麼大規模的書展嗎？」她對香港文化充滿正能量式的評價的同時，也關心那些被讀者買走的書，畢竟在一個商業化的國際大都市，在快節奏的生活中，書本有無被捧讀的機會，又有多少無價值的書被扔掉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芙蓉憶·漫畫四川方言》 用水墨漫畫傳播四川文化



■彭長征以漫畫呈現四川人文風貌。

彭長征《芙蓉憶·漫畫四川方言》新書發佈會暨《雄起》系列新常態畫展早前在成都舉行，巴蜀文化學者袁庭棟、詩人、書法家楊宗鴻等50多位嘉賓齊聚一堂，觀瞻新作。

此次發佈的《芙蓉憶·漫畫四川方言》是繼《芙蓉憶·唱成都》後的第二部作品。全書通過100幅水墨漫畫、100句經典四川方言、100個龍門陣解讀四川人安逸的生活態度和精神狀態。「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戶入畫圖」，書裡有司馬相如的撫琴台，少陵題詠的草堂路，出師一表的武侯祠，織女紡紗的支磯石，八仙遊勝的送仙橋等。風雅華藻的文人詩賦，流離瀾漫的民間故事，閒淡安逸的處世方式，滿足了蜀地文化人關於生活、關於浪漫的完美想像。以反映老成都市井生活為內容的水墨民俗漫畫，用妙趣橫生的故事形式，水墨氤氳的表現方式，談諧幽默的語言腔調，講述着成都這座古城的前世今生，是一份珍貴的關於成都文化、城建、商賈、旅遊、風情、民俗等的歷史文獻資料。

該書作者、創意水墨人物畫家彭長征是一位走遍大江南北、而今回歸故里的蜀地著名文化人。戀成都、唱成都、繪成都，他的系列漫畫都與成都有着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愫。正如他自己所說：「走遍了中國的大城市，北京有大城之美，上海有時尚之美，香港有創富之美，成都有生活之美。城市可以複製，時尚可以追趕，財富可以積累，而生活方式卻構成了成都獨一無二的城市競爭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銳



■《芙蓉憶·漫畫四川方言》



■讀者向遲子建提問。



■香港交流活動現場。

東邊西

文：余綺平

向香港取經

■香港當年處理越南難民的手法值得借鑑。

四十年前，中南半島出現成千上萬的難民投奔怒海，當年香港基於人道主義，曾經收容二十萬名越南難民。最近地中海歷史重現，無數北非難民乘船偷渡至歐洲，結果葬身怒海。歐洲媒體最近呼籲，歐盟應該仿效當年的香港、美國和加拿大，對難民作出合乎人道的安排。

英國《星期》雜誌(The Week)以「越南船民」為題，做了整版報道。文章指出，四十年前聯合國難民公署處理中南半島難民潮的經驗，值得歐盟借鑑。

一九七五年越南統一，國內進行連串社會改革，導致二百萬人相繼乘坐小船，冒險逃往東南亞各地。香港初期准許這些難民登岸暫居，還安排他們住進灣仔的六國飯店，後來因人數太多，沒法照單全收，曾經任由難民船在海上飄浮，船隻一度在南丫島擱淺，船民逃走登陸。港府被迫興建難民營，暫時收留他們。

到一九七九年香港列為「第一收容港」，可先行接收難民，再經西方國家甄別難民資格，合格者，

轉送這些國家定居，剩下的，港府自行遣返越南。到一九八八年香港制訂「甄別政策」——政治難民定為「難民」，經濟移民定為「船民」的，當作非法入境者，要遣返回國。越南船民問題困擾香港二十五年，直到二零零零年最後一個難民營關閉。聯合國難民公署欠下香港十二億港元，至今未還。

香港接收過逾二十萬名難民，約十四萬人最終獲外國收留，六萬人被遣返，獲准定居香港者約一千四百人。

難民潮投奔怒海的歷史近年重演。自二零一一年敘利亞戰爭爆發後，北非難民乘坐小船橫跨地中海逃往歐洲，單單在今年頭半年，已經有二千人葬身怒海。媒體形容，孕育偉大文明的地中海，如今成為大海墳墓，埋葬無數冤魂。

北非難民主要來自敘利亞、厄立特里亞、索馬里和馬里等。俗話說，「人向高望，水向低流。」這些國家的人民因為貧困、內戰或暴政，被迫逃往經濟比較富裕、生活穩定和人權狀況良好的社會定



居，他們的選擇無可厚非。但是，發達社會的資源有限，難以照單全收，導致今日地中海難民潮的悲劇發生。

《星期》雜誌指出，二零一一年至一二年間，由地中海南岸北非逃往北岸歐洲的難民超過五萬名，到了二零一四年的一年間，人數竟上升至二十萬。他們透過人蛇集團安排，乘坐簡陋小船偷渡去歐洲。該雜誌譴責無良「蛇頭」，收了難民金錢後，卻貨不對辦，令難民葬身怒海。

該雜誌更指出，最近歐盟削減海上搜救救渡者的經費，他們顯然無意解決難民潮問題。雜誌呼籲國際間本着人道主義立場，參考當年越南難民的經驗，為地中海難民尋找出路。